

# 「帝國的儲藏室」： 司各特的中國相關書寫、收藏及閱讀

邱剛彥\*

摘 要

歐洲歷史小說之父司各特（Walter Scott）的舊居阿博茨福德（Abbotsford）收藏有大量來自世界各地的文物和書籍，對其中的中華文物（如壁紙）的來源和功能、相關的中國藏書和英國期刊進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從中英文化關係研究層面上看，這可以揭示出十九世紀中英文化關係的某些面貌，為這一時段的中英文化關係研究提供重要的資料線索。從司各特研究的層面看，阿博茨福德收藏品可以反映出司各特對於中華文化的認識及興趣，及其在英帝國海外殖民進程中的微妙身分，同時折射出專屬司各特觀看兩大帝國交往關係的主要管道，證明他不只是一位著名的歐洲作家，還是一位具有世界視野的作家。

關鍵詞：司各特、阿博茨福德、中華文物、藏書、  
浪漫東方主義、中英文化關係

---

\*「帝國的儲藏室」(empire's repository)一詞出自凱蒂·川本勒（Katie Trumpener）的作品《吟遊國家主義：浪漫時期小說與大英帝國》(*Bardic Nationalism: The Romantic Novel and the British Empire*)。

感謝阿博茨福德信託公司（Abbotsford Trust）及琳賽·利維（Lindsay Levy）博士提供一手司各特中國相關收藏的資料，並謝謝二位匿名評審對本篇文章提出極為有用的修改建議。最後，是廣州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教師桐山基金的資助，讓此研究項目得以順利展開，在此致謝。沒有你們的協助，此項研究無法產出今日豐碩的成果。

\* 本文 105 年 5 月 6 日收件；105 年 10 月 7 日審查通過。

邱剛彥，國立陽明大學人文與社會教育中心助理教授（[kchiu@ym.edu.tw](mailto:kchiu@ym.edu.tw)）。

# “Empire’s Repository”：❖ Walter Scott’s Writing, Collection and Reading of China

*Kang-yen Chiu\**

## ABSTRACT

Scott may not have produced much literature in which China featured but, as the Advocates Library Catalogue shows, there is no denying that he did have a collection of nine China-related books in his extensive Abbotsford library. In addition to collecting Chinese books, Scott used Chinese wallpaper, a gift from his cousin Hugh Scott who worked for the East India Company in Guangzhou, China, to decorate the drawing room at Abbotsford. There are also some fine pieces of Chinese porcelain and other objects in the house. I firmly believe that we could gain a better knowledge of Scott’s view on the country and its culture from investigating the novelist’s collection of Chinese objects. The intention to write on this subject is not to satisfy the writer’s personal whim; it is rather to attempt a broadening of our understanding of Scott’s relation with an ancient country as well as the expanding British Empire of his time. Moreover, it is also this work’s intent to emphasise Scott’s status as not only a European writer but also a writer with a worldview.

**KEYWORDS:** Walter Scott, Abbotsford, China, wallpaper, Romantic Orientalism, Sino-British Cultural relation

---

\*“Empire’s Repository” comes from Katie Trumpener’s *Bardic Nationalism: The Romantic Novel and the British Empire*.

\* Kang-yen Chiu, Assistant Professor, Education Center for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Yang-Ming University, Taiwan ([kchiu@ym.edu.tw](mailto:kchiu@ym.edu.tw)).

瓦爾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 1771-1832）是英國著名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傳記作家和文學批評家。在以詩歌創作為主流的英國文學浪漫時期，司各特創作了《威弗萊》系列小說（Waverley Novels），顛覆了傳統表述歷史的方式，極大地提升了小說的文學高度。這令他獲得歐洲歷史小說之父的美名，成為英國文學浪漫時期的主流作家，其作品也成為維多利亞時期各家爭先仿效的對象，比如《金銀島》（*Treasure Island*, 1883）的作者羅伯特·路易士·史蒂文生（Robert Louis Stevenson, 1850-1894）的作品中明顯有司各特的影子，另外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謝爾蓋耶維奇·普希金（Aleksandr Sergeyevich Pushkin, 1799-1837）、法國現實主義大家歐洛黑·德·巴爾扎克（Honoré de Balzac, 1799-1850），以及義大利浪漫文學重要作家亞歷山達羅·曼佐尼（Alessandro Manzoni, 1785-1873）也同樣深受司各特作品的影響（Fleishman 28）。

近年來隨著文學研究領域的不斷開拓，民族文學研究呈現出向世界文學研究轉變的明顯趨勢，西方文學批評界在處理司各特專題時，不再將其局限於英國或蘇格蘭的歷史和文化語境之中，而是更多地將其作品置放於十九世紀初期英帝國及其海外殖民發展的框架下進行討論。<sup>1</sup> 然而在目前的研究中，學界的關注主要還是在於司各特本人及其作品與印度殖民地的關係，尚未涉及司各特對中國的認識。因此，本文試圖從司各特故居阿博茨福德（Abbotsford）的收藏品和藏書入手，整理司各特的收

---

<sup>1</sup> 司各特小說創作初期，英國在美洲、加勒比海、亞洲、紐西蘭和澳大利亞控制人口總數超過四千萬的殖民地（Devine 1）。錯綜複雜的英印關係是浪漫時期作家所處理的核心書寫主題，更是司各特小說的歷史大背景。比如司各特的著名短篇小說《外科醫生的女兒》（*The Surgeon's Daughter*, 1827）就是一部以印度為主要場景的作品，描寫來自蘇格蘭的主人翁參與帝國海外擴張的故事。除了在小說中書寫英帝國的海外擴張之外，司各特還曾透過個人關係協助多位英國年輕人在印度取得發展個人事業的機會。因此近年來，不斷有西方的司各特研究者試圖結合英國的海外殖民擴張歷史，探討司各特小說中的東西方關係和專屬於司各特的東方視野。該方面的主要研究有：克萊爾·拉蒙特（Claire Lamont）作品《愛丁堡年代記》（*Chronicles of Canongate*）中的〈歷史筆記〉（“Historical Note”）。伊恩·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收錄於《老虎與薊花：印度 1760 到 1800 蒂普蘇丹與蘇格蘭人》（*The Tiger and the Thistle: Tipu Sultan and Scots in India 1760-1800*）中的文章〈在印度的歐洲人、新興富豪與咖哩香料：瓦爾特·司各特生活與文學中的印度〉（“Griffins, Nabobs and a Seasoning of Curry Powder: Walter Scott and the Indian Theme in Life and Literature”）。

藏品和藏書，試圖考察專屬於司各特觀看中國的主要管道，說明他所具備的國際視野，以深化司各特研究，同時為十九世紀中英文化關係研究提供更多的資料線索。

以往關於司各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所創作的文學作品上，較少有人針對他費心收藏的物品（尤其是中國藏品）進行研究，更少有人將此二者並比或交叉討論。筆者認為在概念上「文」與「物」之間具有高度的依存關係，「文」需依附於「物」才得以具象化，而「物」則需「文」的妝點才能充分展現其內在價值。「文」與「物」之間的共生關係可從《現代漢語詞典》對於「文物」的解釋得到更好的說明：「歷代遺留下來的在文化發展歷史上有價值的東西，如建築、碑刻、工具、武器、生活器皿和各種藝術品等」（1364）。換言之，文物的基本價值在於它自身組成中兩大元素「文」與「物」之間的相互輝映後所產生的文化意義。阿博茨福德的中國收藏因為司各特在文學上的造詣而有更為豐滿的生命力；相同地，司各特的創作也因他的文物收藏而衍生出更多層次的可解讀空間。因此，本文首先分析司各特小說中的中國元素，接續討論他所珍藏的中國物件，最後探討他有過的中國相關閱讀，期待以此三方面總結司各特與中國的特殊關係。

## 一、司各特的中國書寫

在司各特生活的年代，英國社會雖然深受法國大革命（1789-1799）的影響，政治、經濟和文化生活均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但是在對遠東的關係上，中英之間也經歷著關鍵性的轉變。十六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對中國所做的正面宣揚在歐洲掀起了一股「中國熱」風潮（即所謂的 *chinoiserie*），<sup>2</sup>令西方上層社會對中國的文學、文化和藝術產生景仰與著迷，並在生活品味和藝術風格上多方仿效中國，比如中式庭園的興

<sup>2</sup> 1735 至 1795 年間，北京耶穌會士翻譯了四百多種中文作品（Finlay 47），並請參見大衛·比芬斯（David Beevers）的作品《中國細語：英國 1650 到 1930 年間的中國熱》（*Chinese Whispers: Chinoiserie in Britain in 1650-1930*）。

建，陶器瓷器的製作，儒學的傳播，甚至飲茶風氣的興起等，都是鮮明的例證。從十八世紀後期開始，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歐洲與中國的交流日趨密切，歐洲社會對中國的認識比以往更為深刻且全面，但以往較為正面的評價卻在此時逐步受到挑戰。此外，由於歐洲商人在中國進行貿易受到嚴格的限制，中國社會的保守封閉更加成為歐洲批評中國的主要原因（Kissinger 34）。喬治·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使團訪華（1793）、威廉·阿美士德（William Amherst, 1773-1857）使團訪華（1816）及通商等事的不順利，後來均成為英國在政治及軍事上對華挑釁及侵略的藉口。1839 至 1842 年間，第一次鴉片戰爭發生，這是中英兩國歷史上的首次流血衝突。

鴉片戰爭爆發前的半個世紀，是英國文學史上的浪漫主義時期，當時有不少英國商人在廣州進行貿易。部分我們所熟知的浪漫時期作家同樣有親友在廣州做生意，例如簡·奧斯丁（Jane Austen, 1775-1817）的胞兄佛朗西斯·威廉·奧斯丁爵士（Sir Francis William Austen, 1774-1865）在皇家海軍服役，曾於 1809 至 1810 年間在廣州擔任英屬東印度公司的代理；威廉·華茲華斯（William Wordsworth, 1770-1850）的胞弟約翰·華茲華斯（John Wordsworth, 1772-1805）也曾服務於東印度公司，並在廣州做買賣（Kitson 11）；司各特的表弟休·司各特（Hugh Scott, 1777-1835）同樣受僱於東印度公司（East Indiaman），曾擔任其下刻瑞斯號（*Ceres*）的船長，也在廣州逗留過（Clifford）。值得注意的是，休·司各特的中國經驗成為了司各特間接認識中國的重要管道，這一點後文將做進一步討論。

司各特未曾到過中國，但親友分享的中國經驗加上個人的大量閱讀，使他有機會見證這段重要的中英交往歷史。司各特的著作包含了二十七部小說、十一首長篇敘事詩以及數量龐大的散文作品和日記。雖然沒有一部作品將其關注全然置放在描述中國之上，但仍有為數不少的小說創作點綴提及和中國相關的事物。例如在他的第一部小說《威弗萊》（*Waverley*, 1814）中，高地部落首領費格斯（Fergus）曾談到若將自己

和中國帝王相比，兩者的地位實在相去甚遠；在《羅布·羅伊》（*Rob Roy*, 1817）中，農婦瑪莎（*Martha*）為了彰顯蘇格蘭人引以為傲的待客之道，便將自家釀的酒與最好的中國茶相提並論；在同一部作品中，市政官賈維（*Jarvie*）曾以來自中國的茶款待他的賓客。此外，《海盜》（*The Pirate*, 1821）曾提及從中國返英滿載而歸的東印度公司船艦；《奈傑爾的命運》（*The Fortunes of Nigel*, 1822）曾提到從中國進口的瓷器及裝飾品；《聖羅南的水井》（*Saint Ronan's Well*, 1825）稱揚中國草藥——茶——的神秘療效；《十字軍英雄記》（*The Talisman*, 1825）亦提及由中國織布機所紡顏色鮮豔的布料。在司各特的私人信件中，也有兩封提及中國涼亭以及萬里長城（*Letters* 1: 310; 3: 207）。

《威弗萊》與《羅布·羅伊》分別是關於詹姆士二世黨人（*Jacobitism*）在1745年及1715年起義的故事，背景同樣設定在蘇格蘭高地。《海盜》講述的是十七世紀末發生在蘇格蘭北端小島的故事。《奈傑爾的命運》是以詹姆士一世（*James I*, 1566-1625）統治時期為故事背景。《聖羅南的水井》是《威弗萊》系列小說中唯一一部設定在司各特所處的十九世紀初期，地點是英蘇間的邊境地區。《十字軍英雄記》是關於1187年第三次十字軍東征的故事。簡言之，除了《十字軍英雄記》的地點發生在今日的敘利亞，其餘五部作品皆是設定在英國國境內的故事。儘管這些司各特作品都曾提及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相關事物（茶、瓷器、布料及涼亭等），但這些零散出現的中國相關事物，與故事的主軸及背景，並不具備緊密的關連。此外，因為司各特作品中缺乏對這些事物的具體描述，讀者難以就此拼湊及分析司各特理解與想像中國的完整畫面。這些與中國相關物件的零星出現，極可能是因為在司各特所處的年代，它們已遍及讀者的生活之中，作者信手捻來提及這些物件，也不會讓當時的讀者感到意外。例如《羅布·羅伊》中農婦瑪莎對比英國酒與中國茶，就是

一種很尋常的做法。<sup>3</sup> 如果這些中國物件真有什麼特殊性，它們的存在應當是司各特為了增添個人作品中或多或少的異國風味而做。

因此，筆者據此推論，司各特感興趣的或許不在於中國的語言、歷史、哲學或甚至政治，如上段所列舉的，他所著眼的中國可能更接近於以「物質」為形式的文化存在。這種對中國的感觀充分體現在其故居阿博茨福德的收藏物件中，然而直至今日，尚未有學者著手梳理此方面司各特與中國的關係，也未有學者對阿博茨福德藏品中的中國相關文物進行系統研究。伊莉莎白·霍普·常（Elizabeth Hope Chang）在其著作中曾表示：「除非我們同樣能理解十九世紀作家所觀看之物，否則我們無法明瞭他們書寫的內涵」（3）。<sup>4</sup> 因此，為了能更好地詮釋司各特所創作的「文」，作為讀者的我們有必要去認識及分析司各特所觀看或凝視的中國物件，因為他的收藏將可反映他的創作動機。下文將焦點轉移至司各特故居的主要中國傢俱陳設以及他的藏書上，試圖了解司各特如何「以物代文」，將物件的收集作為他對於中華文化的主要探索管道。

## 二、阿博茨福德的中國風

1812年，司各特從阿序斯提爾（Ashestiel）搬遷到同樣位於蘇格蘭邊區的阿博茨福德，並計畫改建此地的數間舊農舍，以作為日後的宅邸。改建計畫分為兩階段：第一階段從1817年至1819年，第二階段從1822年至1825年。司各特與家人自1812年遷入後，直到過世前都未曾離開。於此期間，司各特花費了大量的精神、時間與金錢裝修此座宅邸，他對於整體的設計有著極高的要求（Wainwright 147-207）。裝修期間司各特一家收到來自各方親友饋贈的禮物，其中一些對日後阿博茨福德的內部裝潢有著非常特殊的用途與意義，比如在一封寫給表弟休·司各特的信件中（1822年10月6日），司各特曾說到：

<sup>3</sup> 英國最早的飲茶紀錄是1657年，十八世紀中期後已受到英國各階層普遍的喜愛與飲用（Macfarlane 66-71）。

<sup>4</sup> 此為筆者譯文。

對於我和我太太而言，沒有什麼可以比你送來的禮物更讓我們感激與歡喜，這份禮物讓我們確信，遠在中國的你仍惦記著我們。明年的夏季，我們打算裝修會客室(drawing room)，這捆壁紙來的正是時候。屆時我會確保將它交由專門的人士掛上。(Letters 7: 261-62)<sup>5</sup>

據考，這捆壁紙是休·司各特送給司各特一家，用以裝飾阿博茨福德的主要會客室以及兩間寢室，而當時休·司各特正服務於英屬東印度公司的廣州分部。這捆一共二十四張以綠色為底的壁紙是在廣州當地手繪而成，當中的彩繪圖案包含一般民眾男女老幼、中國傳統涼亭、牡丹花以及多種中國特有樹木、鳥類和昆蟲，流露出濃厚、和諧的中國鄉村靜謐氣氛。在寫給好友丹尼爾·特里(Daniel Terry, 1780-1829)的二封信中，司各特特意提到他對此壁紙的喜愛：「這是一張極好的中國壁紙」，「會客室的中國壁紙最為美麗」(Letters 7: 279; 8: 213)。<sup>6</sup>對於當時或甚至現在到訪阿博茨福德的參觀民眾而言，這會客室的壁紙是此間宅邸最引人注目的設計之一。今日負責管理阿博茨福德的信託公司(Abbotsford Trust)甚至挑選此捆壁紙的部分圖樣，作為此宅邸的導覽手冊《阿博茨福德——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故居：親手打造的天地：瓦爾特·司各特爵士於阿博茨福德的故居簡介》(Abbotsford, the Home of Sir Walter Scott: The Place I Have Created: A Short Guide to Sir Walter Scott's Home at Abbotsford)封面以及諸多周邊商品的底圖設計。

筆者認為，儘管此壁紙只是司各特眾多重要收藏物件中的一件，但其重要性卻不容小覷。當代司各特研究者安妮·芮歌尼(Anne Rigney)曾指出：「阿博茨福德本身的外部建築，以及它的內部裝潢，都可視為司各特創作的延伸，同樣能被閱讀或可作為司各特小說書寫的參照」(141)。<sup>7</sup>由此可見，在文化意義上，此捆壁紙應當具有相當廣闊的解

<sup>5</sup> 此為筆者譯文。

<sup>6</sup> 此為筆者譯文。

<sup>7</sup> 此為筆者譯文。

讀空間。我們或許能追隨濟慈（John Keats, 1795-1821）的腳步，將此壁紙同比做他在詩歌〈希臘古甕頌〉（“Ode on a Grecian Urn,” 1820）中所駐足讚賞的古甕，因為這兩件藝作品本身的表層故事「敘述」（narrative）都蘊涵著另一層可被解讀的文化意義。筆者認為，正是此壁紙在阿博茨福德的存在，令中國對於司各特一家及其親友而言，不再只是一個遙遠的東方古國，而是當代西方家庭生活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這內嵌于司各特宅邸的壁紙，不僅在空間概念上大大地縮短了東西方的距離，而且在時間軸線上為我們提供了理解司各特觀看與想像中國的可能方式。正如休·奇普（Hugh Cheape）等司各特學者所言：「物質文化提供了一個歷史背景，讓司各特本人徜徉於其中。而這些物件將我們帶入並貼近司各特的私人生活之中」（52）。<sup>8</sup>

儘管於司各特宅邸的眾多西方收藏物中，這摺中式壁紙顯得有些突兀，但卻可以將它解讀成司各特本人的意願，視若他試圖將中國文化融入個人的物質生活之中，並以增添宅邸的浪漫東方色彩。此外，司各特對此壁紙所再現的中國庶民生活的喜愛，也可以被解讀成是司各特私人生活中「浪漫東方主義」（Romantic Orientalism）<sup>9</sup>的一種呈現。顯然，此壁紙所傳達的訊息有別于司各特所創作的普遍東方形象（包含印度及阿拉伯世界）。《十字軍英雄記》以及《外科醫生的女兒》中的東方人物，往往被解讀成西方的對立面，他們代表的多是不友善或甚至是敵對的他者。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Said, 1935-2003）也曾在《東方主義》（*Orientalism*）中批評《十字軍英雄記》裡對於伊斯蘭教歷史英雄人物薩拉丁（Saladin, 1137(?) - 1193）參有偏見的描繪（101-02）。這兩部作品清楚顯現奈傑爾·利斯克（Nigel Leask）所稱「帝國的焦慮」（anxieties of empire）。然而，阿博茨福德會客室牆面上司各特所珍愛的中國壁紙卻是幸福、祥和、友善的具體呈現，它的存在不具有任何政治色彩。儘管此

<sup>8</sup> 此為筆者譯文。

<sup>9</sup> 「浪漫東方主義」（Romantic Orientalism）的說明請參考，《諾頓英國文學選集：線上主題》（*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orton Topics Online*）的網站頁面〈浪漫東方主義：概覽〉（“Romantic Orientalism: Overview”）。

捆壁紙上的圖樣設計非出自司各特本人之手，儘管此壁紙上的圖樣只是片面地呈現中國（非三度空間），但他將此捆中國設計及製作的壁紙嵌入宅邸本身的西方文化框架之中，其本身就可解讀為一種創作，因為此壁紙在此西方語境中已被賦予新的生命與意義。

也許有人會將此壁紙與其他司各特的私人珍藏，例如南非的牛角、馬來西亞的短劍（*Malaysian Krises*）、印度的盔甲以及印加帝國出土的文物，一同聯想及解讀，並將此壁紙視為阿博茨福德這「帝國的儲藏室」的重要收藏（*Rigney 273*）。如此的解讀在某種意義上有它的道理，但筆者認為司各特對此壁紙的熱愛遠非源于對英帝國的歸屬或效忠，而是對中華文物的異域性、藝術性及文化性有著高度的興趣。如伯特蘭·羅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所言：「浪漫主義者的地理很有趣：從上都到荒涼的寇刺子米海岸，他們注意的盡是遙遠的、亞細亞的或古代的地方」（217）。司各特對此來自遠東的壁紙的喜愛正是一個很好的證明。當代學者派翠克·康納（*Patrick Conner*）指出，中國壁紙的出現基本上是一種歐洲現象。中國本身的室內裝潢少見此類裝飾用的壁紙，它們主要是針對歐洲市場進行設計、生產和銷售。在英國，這類中國壁紙於十七世紀後期開始在倫敦販賣，1750及1760年代是此股熱潮的頂峰，而整個十八世紀都有進口的紀錄（138），是十八世紀流行文化的一種風尚（*fashion*）（*Berg 115*）。由此可見中華文化在歐洲的滲透力與影響力。此外，司各特對此壁紙的喜愛正好也說明了他承繼和保留著十八世紀歐洲對於具有中國藝術風格的物品的趣味。

此壁紙證明了中國熱在英國浪漫時期持續發酵，然而本研究特別著眼於它還有另一方面的原因。司各特曾說阿博茨福德是「他所建構的羅曼史」（*romance of a house I am making*）（*Letters 7: 111*）。他總是很有目的地去設計並要求此宅邸內外大小細節所呈現的樣貌。除了想藉由阿博茨福德再現哥德式的浪漫色彩，他更明白此宅邸本身的外觀及內部收

藏將連帶投射他本人的內在特質。<sup>10</sup> 如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 在《物體系》中所揭示的概念：「我們所收藏的，永遠是我們自己」(“what you really collect is always yourself”) (101; *The System of Objects* 97)。司各特的收藏也同樣反映了這個面向。司各特以此來自中國、不易取得、且獨一無二的手繪壁紙妝點宅邸內最主要的對外空間，此動作本身便可解讀成一種「展演」(performance or show)，除了暗示擁有者的特殊身份、地位以及其與英國在遠東事業的特殊關係，它更標示了屋主所內含的「世界觀」(worldview) 或「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以及他本人國際化的程度。這種將「中國性」(Chineseness) 納入個人身份建構的作為，正可反映出如尤金妮亞·詹金斯 (Eugenia Zuroski Jenkins) 所揭示的一種現象：「如果沒有將中國性的概念納入討論，我們將無法理解十九世紀英國人建構身份的方式」(1)。以及「將中國寫入英國，是英國聲明自身在全球關係上作為國際化國家的一種方式」(4)。<sup>11</sup> 簡言之，阿博茨福德會客室壁紙的重要性在於它揭露了司各特與國際社會的密切關聯，並且反向直指司各特本人欲與中華文化產生關聯的強烈渴望。

此外，此種中國手繪壁紙上因為有連貫的故事，因此往往篇幅面積較大，需要足夠的空間才能容納 (accommodate) 得下。司各特的會客室作為一種儲藏以及「展演的空間」(showroom)，除了展示主人的收藏，其內部的收藏品同時也反應出宅邸本身的寬闊及主人的財力。另外，司各特對於中國壁紙的喜愛也證明了他個人有別於庶民品味，而是較為成熟的審美鑑賞力。

除了中國壁紙之外，阿博茨福德還有二十件左右設計精美的中國式瓷器，雖然它們不如會客室的壁紙引人注目，但也忠實地呈現出中國的庶民社會與文化生活。不過，據考證，司各特故居中的多數中國式瓷器並非源自中國，而是歐洲的仿製品。這種歐洲製作的中國式瓷器於十八

<sup>10</sup> 除了司各特的阿博茨福德，由英國作家本人所建構的知名特色宅邸還有霍勒斯·渥波爾 (Horace Walpole, 1717-1797) 的「草莓山莊」(Strawberry Hill) 及威廉·貝克福德 (William Beckford, 1760-1844) 的「芳特希爾別墅」(Fonthill Abbey)。

<sup>11</sup> 此為筆者譯文。

世紀中後期開始大量進入當地的一般家庭。與司各特同一時期的散文家查理斯·蘭姆（Charles Lamb, 1775-1834）曾在散文集《伊利亞隨筆續編》（*The Last Essays of Elia*, 1833）中收錄了〈老瓷器〉（“Old China”）一文，他說過：「我無法意識到，從何時起中國式樣的瓶罐與碟子開始進入我的想像之中」（281）。<sup>12</sup> 同時他也提到此類瓷器是「廉價的奢侈品」（cheap luxury）（282），由此可知在當時的英國此類瓷器因為取得容易，所以普及程度很高，亦受當地民眾的歡迎。<sup>13</sup>

阿博茨福德的中國風無處不在。據統計，在阿博茨福德的瓷器收藏中，有少數幾件確定出產於乾隆年間的中國，不過因司各特未曾留下任何文字記載，所以暫且無法確認這些瓷器的來源。除了壁紙和瓷器之外，還有來自中國的象牙筷子、存放貴重物品的鐵箱、短刀及長戟。這些物品的情況和瓷器類似，雖然很可能是司各特的私人收藏，但因未有相對應的文字記錄留存，所以它們的重要性對司各特本人而言或許就難以和上述的中國壁紙相抗衡。司各特對此壁紙之外的中華文物靜默不語（就如同他在小說中對中國相關事物點綴式的提及而非描述），或許是因為它們在十八世紀中期前後已普遍進入尋常人家，對多數的英國人而言已不足為奇。然而直到浪漫時期結束之前，因對收藏家的種種條件限制（與英帝國海外殖民的關係、財力、宅邸大小及個人審美品味），中國出口的手繪壁紙都未曾普及於庶民生活之中。阿博茨福德未對外開放倉庫中還有其餘四十件左右與中國相關的收藏，包含絲綢畫、衣裳、鼻煙壺和玩偶等，不過據阿博茨福德信託公司（Abbotsford Trust）所提供的資料顯示，它們絕大多數是司各特後代子孫陸續收集而來的。

<sup>12</sup> 此為筆者譯文。

<sup>13</sup> 中國青花瓷器於十六世紀初傳入歐洲，深受貴族階層的喜愛，有貴族甚至直接向中國窯場下單，訂制繪有家族紋章的餐具茶器（Finlay 27）。但自清順治十三年（1656）實行海禁之後，歐洲各國便開始嘗試自行生產。十八世紀初葉，法國耶穌會傳教士殷弘緒（Père Francois Xavier d'Entrecolles, 1664-1741）取得了中國的制瓷秘方，將它傳回歐洲（Finlay 17-18）。1709年在德國邁森（Meissen），約翰·弗裡德利希·波特格爾（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 1682-1719）成功燒制出第一窯中國式瓷器，此後，歐洲制瓷工業逐步發展，到了十八世紀中後期，制瓷工藝的水準已與中國不相上下（Leiper 33）。

### 三、阿博茨福德的中國藏書和英帝國期刊

除了中華文物的收藏，和司各特的創作更加密不可分的是他的閱讀。在阿博茨福德的圖書室內，一共有由六位作家所著九本與中國直接相關的書籍。<sup>14</sup> 它們是司各特藉以觀看與想像中國的另一重要管道，也是我們作為讀者和研究者藉以瞭解形塑司各特世界觀的可能材料。

雖然與司各特的九千多本藏書相比，這九本中國相關書籍在總量上顯得微不足道，但據本研究以及彼得·基特森（Peter Kitson）於2013年出版的《打造浪漫中國：1760-1840年中英文化交流研究》（*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一書共同推論，這九本藏書在英國浪漫時期的中英文化交流史上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基特森在《打造浪漫中國》中曾針對這九本藏書中的其中四本做深度研究，並認為這些著作對他所試圖闡述的「浪漫漢學」（*Romantic Sinology*）的概念，有特殊的貢獻。

司各特珍藏的九本書籍分別涉及中國的文學、語言、文化和歷史，有助於我們瞭解司各特藉以認識中國的另一個重要管道。以下按照書籍作者的出生年份先後順序，做簡要介紹與分析。

#### （一）湯瑪斯·帕西：《好逑傳或愉快的故事》（1761年出版）

湯瑪斯·帕西（Thomas Percy, 1729-1811）最廣為人知的出版是《英詩輯古》（*Reliques of Ancient English Poetry*, 1765），然而在這本詩集問世之前，帕西已于1761年編輯並出版了由旅居廣州的英國東印度公司職員詹姆斯·威爾金森（James Wilkinson）所翻譯的《好逑傳或愉快的故事》（*Hau Kiou Choaan, or The Pleasing History*）（Watt 95-109）。《好逑傳》是第一本英譯的中國古典小說，在譯本問世之後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時間

---

<sup>14</sup> 這些藏書資訊來自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Library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Edinburgh）的網上搜尋系統。

裡被嚮往中國文學文化的西方讀者奉為經典（譚淵 47）。基特森曾指出：「《好逑傳》不僅是中國的再現或是歐洲對於流行中國事物的體現……它不完美，但卻企圖去詮釋並瞭解中國，是一部初生的英國浪漫漢學的先驅作品」（27）。<sup>15</sup> 司各特在一封寫給出版商約翰·莫里（John Murray, 1778-1843）的信件中，特別要求莫里務必取得此書，因為他認為《好逑傳》的「稀有性以及趣味性」可與英國作家夏洛特·史密斯（Charlotte Smith, 1749-1806）的小說《老房子》（*The Old Manner House*, 1793）相媲美（*Letters* 2: 120）。

（二）約書亞·馬希曼（又譯馬什曼、馬士曼）：《孔子全集：包含其原文及譯文》（1809年出版）、《中國文字的字形與聲音論述》（1809年出版）

約書亞·馬希曼（Joshua Marshman, 1768-1838）是浸信會傳教士。他於1799年抵達印度塞蘭坡（Serampore），協助首位抵達印度的浸信會傳教士威廉·凱里（William Carey, 1761-1834）開展傳教工作，其主要任務是出版《聖經》的中譯本（於1822年完成）。1809年，馬希曼出版了《孔子全集；包含其原文及譯文》（*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a Translation*, 1809）（Kitson 60）。這是《論語》的首次英譯，是繼帕西的《好逑傳》英譯本之後第二部中譯英文學作品（64）。而司各特收藏的另一本馬希曼作品《中國文字的字形與聲音論述》（*Dissertation on the Characters and Sound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1809）至今未有人進行過系統化研究。

---

<sup>15</sup> 此為筆者譯文。

### （三）約翰·萊頓：《印度支那語言與文學論述》（1810年出版）

約翰·萊頓（John Leyden, 1775-1811）是詩人、語言學家兼東方學家，也是司各特的好友，曾協助司各特搜集資料，編輯《蘇格蘭邊區歌謠集》（*The Minstrelsy of the Scottish Border*, 1812）一書。萊頓和司各特的關係密切，曾透過司各特的關係獲得印度馬德拉斯（Madras）的助理外科醫師一職（Brown 75）。學界認為，司各特作品《外科醫生的女兒》中的外科醫生亞當·哈特利（Adam Hartley）是以萊頓的一生為範本而寫成（Tulloch）。後來萊頓將個人作品《印度支那語言與文學論述》（*Dissertation on th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of the Indo-Chinese Nations*, 1810）贈與司各特。該書探討印度和中國之間的十四個國家的語言及文學。

### （四）亨利·艾里斯：《晚近訪華日誌》（1817年出版）

亨利·艾里斯爵士（Sir Henry Ellis, 1788-1855）曾陪同阿美士德使團於1816年訪華。此行的任務與馬戛爾尼使團類似，目的是與清政府交涉新的貿易協定，但未獲成功。艾里斯不著迷於中國事物，對其而言，中國人是排外的、極端傳統且不有趣的（Healey）。他將此行的見聞收錄在《晚近訪華日誌》（*The Journey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Late Embassy to China*, 1817）中。此書由約翰·莫里所出版，司各特的收藏來自莫里的饋贈。

(五) 巴茲爾·霍爾：《1816年航向琉球和其他位在東海的國度》（1826年出版）

巴茲爾·霍爾上尉（Captain Basil Hall, 1788-1844）是司各特的友人兼仰慕者。1826年，司各特因輕微中風以及財務危機，身體和精神都處於一個相對低潮的狀態。當時是霍爾利用個人關係說服英政府安排船隻，專程載送司各特及其女兒到那不勒斯（Naples）養病。霍爾的《1816年航向琉球和其他位在東海的國度》（*Voyage to Loo-Choo, and Other Places in the Eastern Seas, in the Year 1816*, 1826）一書是第一部由歐洲人所完成關於朝鮮的記錄。霍爾曾與司各特分享自己在琉球群島的經歷，以及在聖赫勒拿（St Helena）島上和拿破崙面談的經過（Johnson 618, 1190-91）。司各特曾在個人的作品《拿破崙傳》（*The Life of Napoleon Buonaparte*, 1827-1828）中提及阿美士德勳爵在聖赫勒拿與拿破崙面談的情形，這些訊息很可能來自於霍爾與上述艾理斯的分享。

(六) 約翰·法蘭西斯·大衛斯（又譯爹核士、德庇時和戴維斯等）：  
《散家財天賜老生兒》（1817年出版）、《十二樓》（1822年出版）、  
《幸福的婚姻》（1829年出版）

約翰·法蘭西斯·大衛斯（John Francis Davis, 1795-1890）是湯瑪斯·帕西的學生，在十八歲時被挑選為東印度公司在廣州的抄寫員。基特森指出，大衛斯「首先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一員，然後服務於英國皇室……是英國在中國執行政策的要角……大衛斯認為中國文學的翻譯和英國在亞洲的利益極其相關」（Kitson 106-07）。<sup>16</sup> 大衛斯曾擔任阿美士德訪華使團的翻譯官。司各特一共收藏了三部大衛斯的譯作。《散家財天賜老生兒》（*Laou-Seng-Urh, or "An Heir in His Old Age": A Chinese Drama*）

---

<sup>16</sup> 此為筆者譯文。

是元代戲曲作家武漢臣的作品，大衛斯的譯本於 1817 年在倫敦出版。同年九月四日，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閱畢此劇本後，曾寫信給友人克納伯爾（Karl Ludwig von Knebel, 1744-1834）並評價說：「我們一談到遠東，就不能不聯想到最近新介紹來的中國戲劇。這裡描寫一位沒有香煙後代不久就要死去的老人的情感，最深刻動人」（陳銓 82）。歌德大力稱揚武漢臣在描繪人物情感上所達到的高度成就，由此可見原著及其譯本之影響力。大衛斯的另一本譯著是明末清初文學家、戲曲家李漁（1611-1680）的章回體白話短篇小說集《十二樓》（*Chinese Novels*, 1822），又名《覺世明言》。原著共有十二卷，大衛斯翻譯了其中的三卷，分別是〈合影樓〉（“The Shadow in the Water”）、〈奪錦樓〉（“The Twin Sisters”）和〈三與樓〉（“Three Dedicated Rooms”）。大衛斯在中國文學作品翻譯方面的成就卓越，不過對於基特森而言，大衛斯對於浪漫漢學的更大貢獻在於追隨帕西的腳步，於 1829 年將《好逑傳》重譯為《幸福的婚姻》（*The Fortunate Union*），這是《好逑傳》的第二個英文全譯本。基特森據此推斷，大衛斯將中國文學納入世界文學體系的貢獻不下於帕西與歌德，他也是將中國文學推上世界文學舞臺的先驅之一（106）。

以上司各特收藏的中國相關書籍及譯本，不僅是英國浪漫時期中英文化交流的結果，也是兩大帝國交往關係的重要見證。在這九本著作中，《好逑傳》、《散家財天賜老生兒》、《十二樓》和《幸福的婚姻》均是具有代表性的明清時期通俗文學作品，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明清官場的狀況與庶民的生活，同時也能反映司各特對中華文化的興趣。

然而，有人也許質疑司各特是否切實閱讀過這些作品。目前能夠判斷的主要方法是檢視這些書籍是否有閱讀後的批註，以及所有的內頁是否業已拆封。琳賽·利維（Lindsay Levy）博士曾擔任蘇格蘭律師公會圖書館（Library of the Faculty of Advocates, Edinburgh）特聘館員，專門負責為司各特的九千本藏書編輯目錄，是目前世界上為數不多的司各特藏書研究專家。她指出，司各特的中國藏書中沒有留下任何批註的記錄，

但所有的內頁都已拆封，她並無直接證據證實但在與她的訪談中，利維肯定司各特已閱讀上述他所擁有的中國書籍，因為在阿博茨福德的藏書中，只有極少數是司各特未曾碰觸過的。利維還進一步指出：「阿博茨福德的圖書室可以做為撰寫司各特傳記時的重要資源，它尤其能釐清那過去被早期傳記作家所忽視和扭曲的事實」（225）。<sup>17</sup> 阿博茨福德圖書室的中國藏書，對於以寫小說為本行的司各特而言或許具有啟發的作用。雖然目前未能取得直接的證據得以證實司各特曾閱讀上述九本書籍，但我們或許能將這些書籍的功能同比於前述壁紙，因為他們同樣以內含的東方元素妝點了司各特的西方宅邸。

以上對中國壁紙和藏書的分析，從側面詮釋了司各特與中國的關係。雖然司各特不曾直接論述過中國，但他本人的中國收藏確實來自那些曾經參與英帝國海外擴張的親友。再者，因為英帝國在中國的發展才得以讓司各特有機會取得這些物件，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而從司各特的中國藏書書目推斷，司各特對當時中英之間在政治、文學和文化上的交流與互動並不陌生，並且他對上述中國相關書籍的興趣，也能展現他作為歐洲歷史小說之父所內含關注世界文學發展的特質。

退一步說，即便學界目前沒有直接證據證實司各特曾閱讀上述書籍，但有一點是肯定的，司各特在幼年時讀過《一千零一夜》（*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從而對中國具有最初的認識，並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司各特的女婿約翰·吉布森·洛克哈特（John Gibson Lockhart, 1794-1854）在他所撰寫的《瓦爾特·司各特爵士傳》（*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1837）中曾提到：

有位來自拉弗爾斯頓家族的女士，在某次閒聊的過程使我憶起此事。即便司各特的父母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受到長老派教會教條的嚴謹規範，但他的母親比起同時代的其他婦女對文學有更高昂的興趣，她曾鼓勵司各特發展對莎士比亞的喜

<sup>17</sup> 此為筆者譯文。

好。不管是莎士比亞的劇本，還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幼年的司各特都曾在家庭聚會時高聲朗讀，這些書籍陪伴司各特一家度過許多歡樂的時光。（31-32）<sup>18</sup>

《一千零一夜》中的許多故事都提到中國，雖然這些故事對中國的描繪或許並不十分準確，但卻為年幼的司各特提供了想像中國的機會，就如《一千零一夜》中的阿拉伯及印度故事在司各特寫作上所起的作用一樣。

除了書本，期刊（periodicals）也是司各特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讀物。期刊是英國浪漫時期的特殊產物，是知識在公共空間（the public sphere）傳播的主要媒介，更是廣大知識份子發聲的重要管道。當代學者馬克·舍恩菲爾德（Mark Schoenfield）在其著作《英國期刊與浪漫時期身份認同》（*British Periodicals and Romantic Identity*）中表示，期刊是浪漫時期英國人身份認同的重要媒介。司各特不僅是《愛丁堡評論》（*Edinburgh Review*）等英國重要期刊的撰稿人，而且是《季度評論》（*Quarterly Review*）的幕後推手（Ragaz 119）。創立《季度評論》的想法是由司各特的出版商約翰·莫里所提出。司各特雖曾婉拒莫里的邀請擔任此期刊的首任編輯，但他仍在《季度評論》的創刊階段積極參與主編、撰稿者以及評論書籍的挑選工作。此外，在首任編輯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 1756-1826）的任內（1809-1824），司各特還發表了二十四篇文章，主要包含與蘇格蘭相關的歷史、文學及文化等議題。司各特的女婿洛克哈特也曾在 1826 至 1853 年間擔任《季度評論》的第三任編輯，可見司各特及其一家與《季度評論》的密切關係。司各特在《季度評論》初期階段的積極參與直接定調了此期刊的政治及文化走向，<sup>19</sup> 他本人雖然未曾對英帝國在亞洲的事業進行評論，但《季度評論》中相當高比例的文章涉及英帝國在亞洲的殖民發展，在很大程度上可能是因為

<sup>18</sup> 此為筆者譯文。

<sup>19</sup> 《季度評論》的創立主要為了從托利黨（the Tories）的保守角度制衡《愛丁堡評論》傾向輝格黨（the Whigs）的激進政治觀點。

司各特的積極介入。而司各特對亞洲事務的掌握，或許也因為曾大量閱讀該刊物的相關文章。

在《季度評論》的撰稿人中，最積極報導英帝國事業的是約翰·巴羅（John Barrow, 1764-1848）。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旅遊家、作家和殖民官員，又是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的重要成員、皇家地理學會（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的創始人之一和海軍部（Admiralty）的二等秘書。1809至1841年間，他在《季度評論》上一共發表了二百多篇文章，成為刊物的主要撰稿人之一（Cameron 133）。巴羅曾在《季度評論》上評論馬希曼所譯的《論語》（332-46），利用《季度評論》宣揚並推進英帝國在亞洲的事業。他對中文的掌握在當時的英國少有人企及，並曾隨同馬戛爾尼訪華（Cameron 144）。《愛丁堡評論》的主編法蘭西斯·傑佛瑞（Francis Jeffrey, 1773-1850）讚譽他所撰寫的《中國之旅》（*Travels in China*, 1804）是當代對中國最為忠實的報導（Cameron 139）。邁克爾·阿達斯（Michael Adas）指出，「巴羅的評論是浪漫時期英國評價中國的核心概念，後來更成為十九世紀英國論述清帝國的主要依託」（183）。<sup>20</sup> 值得一提的是，巴羅的《中國之旅》寫在《季度評論》的創刊（1809）之前，因此他在《中國之旅》中所描述的中國可做為他在《季度評論》上所發表相關文章的重要參照。司各特作為《季度評論》的幕後推手和忠實讀者，無疑關注過巴羅在此期刊上所發表和英帝國亞洲殖民發展相關的文章。此外，司各特也曾與巴羅本人會面並有郵件往返的紀錄，因此筆者認為巴羅的文章對司各特理解中國的視角選擇也產生過直接影響。

#### 四、結語

阿博茨福德藏有司各特窮盡畢生精力收集而來的中世紀古物，同時又配置有全蘇格蘭首座現代化煤氣燈，在時間的縱軸上顯示出司各特既

---

<sup>20</sup> 此為筆者譯文。

迷戀過去又引領未來；此外阿博茨福德的收藏橫跨地理疆界的東西方，在時間的橫軸上展現出司各特本人對於不同文化的關注與喜愛。

通過上述分析筆者認為，司各特藉以認識中國的各種管道突顯了他與一個快速擴張的英帝國之間的關聯。司各特不曾擔任殖民官員，他更不是帝國主義者，但他卻熟悉帝國發展的事務；司各特不是漢學家，亦不懂漢語，但他對中國相關文物卻有相當的興趣。本文將司各特放在東亞的舞臺上研究，從他所創作的「文」延伸至他所收藏的「物」做分析，並且以「物」（主要為壁紙）代「文」去了解他獲取遠東文化知識的媒介，並突顯他藉「中華文物」的收藏以形塑個人的身分。如此的研究有利於讓司各特從西方邁向東方，使他不再只是讀者過去所認識的西方語境下的作家，而是展現出他所內涵關注中華文化的特質的一面，讓我們對他本人及其為小說及宅邸的投入有了嶄新且更為全面的認識。

## 引用書目

### 中文

陳銓 (Chen Quan)。《中德文學研究》(*A Study of Chinese and German Culture*)。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

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辭典編輯室 (Dictionary Editorial Division,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現代漢語詞典》(*Contemporary Chinese Dictionary*)。第六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2。

尚·布希亞 (Jean Baudrillard)。《物體系》(*The System of Objects*)。林志明譯。台北：時報文化，1997。

伯特蘭·羅素 (Bertrand Russell)。《西方哲學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 (上)。馬元德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譚淵 (Tan Yuan)。〈《好逑傳》早期西方譯本初探〉 (“The Early European Translations of Hao Qiu Zhuan: A Tentative Discussion”)。《中國翻譯》(*Chinese Translators Journal*) 第三期 (2005)。47-51。

### 英文

Adas, Michael. *Machines as the Measure of Men: Science, Technology, and Ideologies of Western Dominance*. Ithaca: Cornell UP, 1989. Print.

Barrow, John. “Progress of Chinese Literature in Europe.” *Quarterly Review* 11:22 (1814): 332-46. Print.

Baudrillard, Jean. *The System of Objects*. Trans. James Benedict. London: Verso, 1996. Print.

Beevers, David, ed. *Chinese Whispers: Chinoiserie in Britain in 1650-1930*. East Sussex: Royal Pavilion & Museums, 2008. Print.

Berg, Maxine. *Luxury and Pleasure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Oxford:

- Oxford UP, 2005. Print.
- Brown, Iain Gordon. “Griffins, Nabobs and a Seasoning of Curry Powder: Walter Scott and the Indian Theme in Life and Literature.” *The Tiger and the Thistle: Tipu Sultan and Scots in India 1760-1800*. Ed. Anne Buddle, Pauline Rohtagi, and Iain Gordon Brown. Edinburgh: National Gallery of Scotland, 1999. 71-79. Print.
- , ed. *Abbotsford and Sir Walter Scott: the Image and the Influence*. Edingburgh: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Scotland, 2003. Print.
- Cameron, J. M. R. “John Barrow, the *Quarterly’s* Imperial Reviewer.” Cutmore. 133-50.
- Chang, Elizabeth Hope. *Britain’s Chinese Eye: Literature, Empire, and Aesthetics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Stanford: Stanford UP, 2010. Print.
- Cheape, Hugh. Trevor Cowie and Colin Wallace. “Sir Walter Scott, the Abbotsford Collection and the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Brown. 49-89.
- Clifford, Helen. “Chinese Wallpaper Case Study: The Importance of Gifts.” *East India Company at Home, 1785-1857*. Leverhulme Trust, 19 Aug. 2013. Web. 7 July 2015.  
 <<http://blogs.ucl.ac.uk/eicah/chinese-wallpaper-case-study/chinese-wallpaper-case-study-the-importance-of-gifts/>>
- Conner, Patrick. *The China Trade 1600-1860*. Brighton: The Royal Pavilion, Art Gallery & Museums, 1986. Print.
- Cutmore, Jonathan. *Conservatism and the Quarterly Review: A Critical Analysis*. London: Pickering & Chatto, 2007. Print.
- Devine, T. M. *To the Ends of the Earth: Scotland’s Global Diaspora 1750-2010*. London: Allen Lane, 2011. Print.
- Finlay, Robert. *The Pilgrim Art: Cultures of Porcelain in World History*.

-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 of California P, 2010. Print.
- Fleishman, Avrom. *The English Historical Novel: Walter Scott to Virginia Woolf*.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71. Print.
- Healey, R. M. "Ellis, Sir Henry."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P, n.d. Web. 6 June, 2015.  
<<http://www.oxforddnb.com/index/101008697/Henry-Ellis>>
- Jenkins, Eugenia Zuroski. *A Taste for China: English Subjectivity and the Prehistory of Orientalism*. New York: Oxford UP, 2013. Print.
- Johnson, Edgar. *Sir Walter Scott: The Great Unknown*. London: Hamish Hamilton, 1970. Print.
- Kissinger, Henry. *On China*. New York: Penguin, 2012. Print.
- Kitson, Peter J. *Forging Romantic China: Sino-British Cultural Exchange 1760-1840*. Cambridge: Cambridge UP, 2013. Print.
- Lamb, Charles. "Old China." *Elia and The Last Essays of Elia*. Ed. Jonathan Bate. Oxford: Oxford UP, 1987. 281-86. Print.
- Lamont, Claire. "Historical Note." *Chronicles of Canongate*. Edinburgh: Edinburgh UP, 2000. 360. Print.
- Leask, Nigel. *British Romantic Writers and the East: Anxieties of Empire*. Cambridge: Cambridge UP, 1992. Print.
- Leiper, Susan. *Precious Cargo: Scots and the China Trade*. Edinburgh: National Museums of Scotland, 1997. Print.
- Levy, Lindsay. "A Life in Books: Walter Scott's Library at Abbotsford." Diss. University of Glasgow, 2014. Print.
- Lockhart, J. G. *Memoirs of the Life of Sir Walter Scott*. Edinburgh: Robert Cadell, 1842. Print.
- Macfarlane, Alan, and Iris Macfarlane. *Green Gold: The Empire of Tea*. London: Ebury, 2004. Print.
- Abbotsford, the Home of Sir Walter Scott: The Place I Have Created: A Short*

- Guide to Sir Walter Scott's Home at Abbotsford*. Melrose: Abbotsford Trust, 2013. Print.
- Ragaz, Sharon. "Walter Scott and the *Quarterly Review*." Cutmore. 107-32.
- Rigney, Ann. *The Afterlives of Walter Scott: Memory on the Move*. New York: Oxford UP, 2012. Print.
- "Romantic Orientalism." *The 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 Norton Topics Online*. Norton. Web. 23 Feb. 2016.
- < <https://www.wwnorton.com/college/english/nael/welcome.htm> >
- Said, Edward W.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1978. Print.
- Schoenfield, Mark. *British Periodicals and Romantic Identity: The "Literary Lower Empir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Print.
- Scott, Walter. *The Letters of Sir Walter Scott*. 12 vols. Ed. H. J. C. Grierson. London: Constable, 1932-37. Print.
- Trumpener, Katie. *Bardic Nationalism: The Romantic Novel and the British Empire*.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97. Print.
- Tulloch, Graham. "Scott, India and Australia: Personal and Literary Connections." *Global Romanticism. The 2nd Biennial Conference of the Romantic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 U of Sydney, Australia. 2013. Address.
- Wainwright, Clive. *The Romantic Interior: The British Collector at Home 1750-1850*. New Haven, 1989. Print.
- Watt, James. "Thomas Percy, China, and the Gothic." *The Eighteenth Century* 48.2 (2007): 95-109. Print.